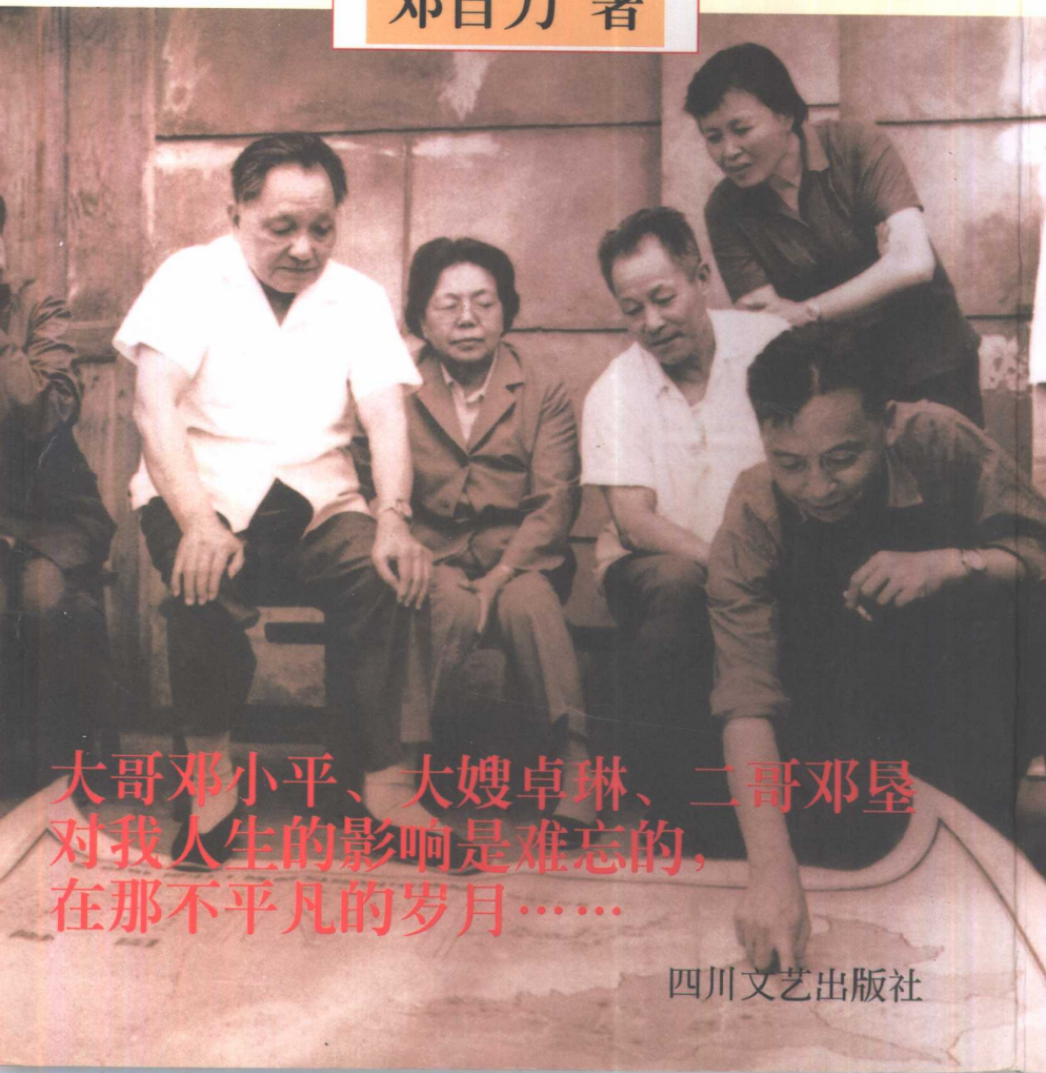


坎坷人生

邓自力 题

邓自力 著



大哥邓小平、大嫂卓琳、二哥邓垦
对我人生的影响是难忘的，
在那不平凡的岁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坎坷人生

邓自力 题



邓自力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成都



1949年，作者在湖北省通城县任县委书记兼县长时，同妻子谢湘合影。



1971年7月，作者大儿子邓晓燕下放农村回市，被华中工学院录取时的全家合影。
(前排右起，妻子谢湘、作者、大女邓妮娜，后排右起，小儿子邓晓光、大儿子邓晓燕、二儿子邓晓蒙)。



1952年，邓小平赴京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时，在北京的全家合影。



1952年，作者（二排中）任四川省工会副主席时，回故乡与父亲和亲戚们的合影留念。



1978年，作者率川剧团赴京演出时，邓小平同志接见老艺人。



1978年，作者(右二)陪同邓小平去峨眉山途中。



1981年，作者任四川省文化厅厅长时，率川剧团赴香港演出。



1987年，作者在金牛宾馆（毛主席曾下榻处）和邓小平合影（右起，作者、邓小平、外孙李强（前）、作者大女妮娜、妻子谢湘、小平夫人卓琳、小平继母奶奶）。



1996年，随四川广安地区代表团上北京给大哥邓小平祝寿时，在大哥卧室门前留影（右起，谢湘、卓琳、作者、邓先琼）。



1996年，作者和邓垦二哥（右二，邓小平二弟）在广安地区参观学习。



1998年，作者在广安地区参观时，到大哥邓小平和三哥邓垦母亲墓前悼念(前邓垦、后作者)。



泸州建市五周年，作者在老窖酒厂参观题词。



省人大任职期间，作者在温江全省农业会议上讲话。



1997年7月，全家合影（前排右起，大儿子邓晓燕、大女儿邓妮娜、作者、孙女邓漫林（前）、谢湘、儿媳郭莉，后排右起，小儿子邓晓光、外孙李强强、孙子邓飞）。



邓小平同志故居。



作者故居全景。

目 录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1)
学生时代	(3)
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18)
延安生活	(36)
在党内第一次受屈	(43)
南征	(50)
保卫延安	(65)
调入刘邓大军	(67)
随军南下	(78)
在解放初期的日子里	(88)
大跃进的困惑	(123)
下放纳溪那难忘的岁月	(145)
欢欢喜喜过个年	(180)
兴水利 修铁路	(199)
十年浩劫	(224)
与小平大哥二三事	(316)
在省政协期间	(336)
再回延安	(341)
在省人大期间	(345)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正当全世界和华夏大地处在动荡、大变革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来到了人间。

我出生在四川广安一个农民的家庭。父亲名绍伦，是一个农民兼手工业者。父亲青年时左脚受寒红肿，后因被误诊病情恶化落下残疾，行动不便。为供家养口，父亲一方面挑担扶犁什么农活都干；另一方面学习裁缝补贴家用。父亲撑着残疾之躯干农活，中年以后视力变差，手不再灵巧还坚持为人缝衣的身影，在我记忆中常常浮现出来，至今难以忘怀。母亲是一位勤劳的家庭主妇，全家人的衣食住行都由她操劳，农忙时帮着做些田间农活，平时要耕种菜地。我家的菜地因母亲辛勤管理，除供全家人食用外，还可供两头架子猪的青饲料。我家田地不多，全部由自己耕种也难够糊口。如遇年景不佳就缺粮，只好向亲朋邻里借贷。那时农村农民之间借贷一般不出利，但秋收后无论自家收成如何，都得如数偿还，以免失去信用。秋收时节，看似稻谷杂粮满仓，随着时间的推移，库内粮食像流水般不断减少，常

常到过年时，粮食已所剩无几。大年一过往往就无口粮了。父亲望着仓门叹气不止，母亲在一旁默默流泪，于是糠菜当做半年粮的我们一家，只得艰难度日了。

我家乡那时五年就有二年旱，大旱年全家靠吃野菜、观音土挣扎在生死线上。村里路旁饿死的人不少，大家就这样一年复一年地度着日月。

我家兄弟姊妹多，父母供养我们十分艰辛。家境困难，但父母和睦，很少争吵。在我记忆里，他们俩总是一个说着话，另一个就默默地听着，非常默契。我的两个哥哥长我很多，在我很小时他们已长大成人，并在社会上找到工作，多少能挣些钱。那时家境穷被人看不起，为撑持门庭要讲衣着交朋友，而他们的收入连自身也难保。有时母亲和姐姐们熬更赶夜纺纱的钱，也得拿来资助他们，一家人互相支持过得也很和睦。

学 生 时 代

四岁左右家里就送我上学，当时家里虽穷，但父亲这样做也有他的打算。我小时很淘气，人小帮家里干不了什么农活，成天乱跑，爬树取鸟蛋，摘水果、黄瓜，还闹得大人们为我担心。父亲说，弄不好手脚摔断，花钱医不说，还可能落得像他一样的残疾。上学有先生管教，多少总能认识几个字，将来总会有用。父亲的意见得到两个哥哥的一致赞成，只有我母亲怜惜我人小，关在学校去会失去很多自由。但父亲已做出决定她也无法改变。为了让我上学时能有一身像样的衣服，母亲省吃俭用节省下几个钱，买了些棉花，和我两个姐姐熬更赶夜纺花织布，然后到染坊染成灰色，给我做了一套体面的学生服。上学那天，我穿上新衣新鞋一副学生模样，觉得特别体面，再加上看到还有许多小朋友，于是本来不想上学怕受束缚的心情便一扫而光。

三十年代，四川农村的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主要学科是语文和算术，此外是练习毛笔字。体育、唱歌、珠算也学习，但不考试。语、数考试不及 60 分的也要

补考，补考不及格的要留级。

小学功课很简单，可我因年龄小，又贪玩，常常回家后不愿读课文，宁愿父亲让我去放牛。天黑后家里不点灯，除非大人有事才点一下，于是学的课文往往记不住，也背不出来。记得我当时的老师姓陈，五十多岁的一个老头，头有些偏向一方，我们怕他，叫他陈偏脑壳。每天他都要抽学生到他讲台上背课文，虽然每次不是全部抽遍，但每月总要抽到几次。当老师点名时，我最怕抽到我。每当让我背诵课文时，因同时背诵的有两三个学生，所以我大多能混过去。有时因背不出或背错被先生发现了，先生会大声呵斥。我惟恐头上遭竹片打，便心慌意乱结结巴巴不知所云，于时只有遭一顿竹片打。先生要求严格，可能也是信奉“黄荆条子出好人”的俗规吧，打起人来绝不手软，常要打得我们头破血流，“满脸红光”方肯罢手。小学时我最怕的就是背诵，不过日后想来也因此才学了点知识，也应感激先生才是。

我初小顺利毕业后进入高小，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建立了苏维埃政府。1933年秋，大军南下直逼广安，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从我们校门前路过，两天两夜人流不断。学校老师四散，学校停课。我当时见此情景，又惊又喜，喜的是听说红军来了，要打土豪分田地，我家是自耕农属红军保护之列；但又听说红军不爱知识分子，我能识几个字，会不会不喜欢我？乡下传说很多：说红军武器尽是大刀长

矛，战士会妖法，身上子弹打不进去，无论向他们身上射多少枪弹，他们头上的红头巾都会吸了去。红军只用手将头巾一抖，子弹便会雨点般落地，因此国民党的白军一见红军战士，手持刀矛冲来，就会溃不成军的四处逃命。“苏维埃”是个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传闻。大人们常以此来哄吓小孩，说再哭再闹“苏维埃”就来把你吃了。

红军入川不久就占领了川陕边界的大片地区。队伍壮大很快，其势直逼广安，眼看要取重庆，但不知何故大军抵达我县边境时，却挥师西北向草地方向去了。正当川北一带红军的消息闹得热火朝天时，一天上午我去协兴镇了解学校开学的情况，一进入校门，只见校园狼藉一遍，教室里横七竖八地睡着保安，稻草满地，学校已成了过路军队的宿营地了，只有打铃的校工守在学校。看到这种情况，我知开学已无望，刚从校门出来，碰见我姐夫徐伯涵。他要我将一背篋书背回家，并千叮万嘱咐地要我不要被人发现，发现了会被杀头的。我因是小孩，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也就应允了这件事，并对姐夫说：“我背回去就是了，我不怕。”

我把这些书背回家一看，全是些红封面，与一般书不同。翻阅一下，我也看不懂，只见书的第一页有大胡子外国人的像。当晚姐夫来到家中，说起书是二哥从上海寄回川的，要好好保存。当时四川军阀杨森大肆杀害共产党，查出这些禁书是会定罪的。我想，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些书既是二哥寄回来的，以后平静下来

看一看，到底如何闹革命，总会有用的。于是我和姐夫将书放进一个坛子，再将它埋在房后，并用稻草掩盖。父亲看我们神秘的样子，知是危险之物，惶恐地注视着我们的行动。母亲却安详地做针线，只是时不时地抬头看看我们。

红军离开广安又回来时，我们将书从坛子里取出，可惜已被水浸成一块块砖一样了。我们忙将书摊开在太阳下晒，干后才恢复原样。我捧起书认真阅读，只知道有《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等。我当时虽不懂，但知道这些是革命的书，保存起来以后可以此为证，证明我是要革命的，请求红军批准我参加革命队伍。

辛亥革命时，孙中山先生领导民众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人民期望生活能逐渐改善。谁知国家很快陷入军阀割据内战不绝的境地。广安当时也和全国一样，军阀争斗，年年打仗，民不聊生。四川军阀多如牛毛，都想称雄于世，便大征粮草和抓壮丁，百姓苦不堪言。我家正好住在公路边，每次遭遇败兵或游勇，都会被翻箱倒柜，抢劫一空。一次，家里仅剩的几升米也被强行抢走。当时我大哥和母亲上前哀求，却被一匪兵用枪托在大哥胸前猛击一下，另一匪兵将粮食颗粒不剩地抢走了。家里无米下锅，只好用菜充饥。我母亲常说：“命该如此，如果我们不住在大路边，也许可以躲过一些灾祸的。”那年月，匪盗猖獗，每日都在心惊胆战中度过，加上税名繁多，有田赋税、人口税、屠宰税、鸦片税